



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的指导下,在中国出版传媒集团的支持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捐资,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于2020年12月设立“高等学校优秀思政课教师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生奖教(学)金”项目。项目旨在发现一批政治素质好、专业水平高、学风作风正的高校思政课教师领军人才和优秀后备人才,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整体水平高质量发展。

本报特别推出“先生之风”栏目,聚焦曾入围“高等学校优秀思政课教师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生奖教(学)金”项目、在思政教育研究与实践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诸位“大先生”,追溯其思想脉络,彰明其学术薪传,讲述他们的治学故事与育人点滴,感受他们的坚守与情怀。他们的一言一行便是最生动的“思政课”——让我们一同走进“先生之风”,感受那份山高水长的精神力量。

马建青:于细微处育人 于心灵处扎根

□ 本报记者 金锐

1987年,马建青在浙江大学同时做了两件事:创办了全国最早一批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开设了国内第一门“大学生心理健康”课。从半导体专业毕业后,马建青留校做了2年辅导员,之后攻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第二学位,毕业后在学校德育教研室当教师。

“做辅导员那几年,我切身体会到,学生的许多问题光靠讲大道理是解决不了的。”马建青说。他观察到,那些被归为“思想品德问题”的困扰,比如交往的烦恼、学业的压力、情感的困惑等,许多其实是心理层面的问题。如果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也难以真正入脑入心。

从那时起,马建青始终站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健康教育的交汇处,既是探索者也是实践者。2022年,马建青获得首届高等学校优秀思政课教师奖教金一等奖。

在争议中走出融合之路

在创建心理咨询中心和开设心理健康课的初期,马建青面临一个核心问题: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到底是什么关系?

“当时争论很大。”马建青回忆,“医学界、心理学界的人不愿意把心理咨询与思政挂钩,担心影响专业性;思政界也有顾虑,认为引入心理咨询可能会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

作为既做思政教育又做心理工作的“两栖人”,马建青的视角不同。他看到在发展性咨询领域,包括帮助学生应对学习压力、解决人际困扰、规划生涯、处理情感问题等方面,两者内容高度重合。思政工作者如果借鉴心理

咨询中尊重、共情、真诚的理念和方法,可以提升工作的亲和力和有效性。

1989年,马建青发表文章,明确提出心理健康教育是学校德育的组成部分。这个观点在当时并不被普遍接受,但他却坚持了30多年。

“推动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这件事,一方面因为二者确实有内在关联,另一方面融合之后更便于开展工作。”马建青说。正是实践中的身份认同,驱使他持续探索两者的融合之道。

1993年,马建青主持了国内第一个以“心理咨询”命名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研究心理咨询对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此后,他又主持多个重要课题,系统研究两者结合的方式、机理、得失与未来发展。

“现在大家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了。”马建青说。从最初文件里的一句话,到后来的一大段话,再到专项文件的出台,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逐步确立。在马建青看来,这种结合对双方都有利:心理健康教育借助思政工作的组织体系、人员力量等获得了快速发展;思政工作因吸收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和技术,进一步拓展了外延、提升了实效。

当然,马建青也注意到结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有些地方行政化色彩过重,影响心理咨询的专业性,但他认为“总的来说,利远大于弊”。

赶赴汶川的一个月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马建青受浙江省委、省政府委派,担任浙江省



马建青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获首届高等学校优秀思政课教师奖教金一等奖、全国首届思政课教师影响力年度人物标兵、浙江省首届教学名师,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教改项目20余项,发表论文160余篇,著作《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结合30年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赴广元支教团团长兼心理援助队队长,带领83名队员奔赴灾区工作整整一个月。

出发前,家人的担忧写在脸上。当时电视里每天报道灾区的惨状,余震不断,卫生条件堪忧、传染病风险未知……马建青和团队成员带足了一次性衣物,做好了艰苦环境下的各种准备。在前往灾区的路上,他们第一次经历余震,住在墙上有裂缝的宾馆里,马建青坦言“大家还是挺紧张的”。

到达广元后,团队迅速投入工作。他们的主要驻地是帐篷教室——

学校建筑大多已倒塌或成了危房,学生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继续上课。心理援助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面向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开展工作——那一年,灾区的高考推迟了一个月,这些学生在失去亲人、家园被毁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学习。除了讲课,他们还组织团体辅导活动,帮助学生释放情绪、重建信心。

团队的援助对象还包括当地教师、干部、群众、救援官兵和各地赶来的志愿者等。马建青组织团体辅导,为压抑已久的教师缓解情绪,为身心受到冲击的年轻官兵开展心理安抚,为失去双亲的孤儿做一对一心理支持……离开灾区时,许多人感谢马建青团队的到来,认为自己“心里有底了,不慌了”。

离开灾区前,马建青组织了一场大型活动,当“四川加油”“四川雄起”的口号在操场上响起时,许多人感到一种集体的力量。学生给马建青团队的留言让他们感动不已——让“幼小的心灵”感到温暖,让身处绝境中的人知道“不是孤军在奋战”——这些文字,马建青一直保存着。

作为支教团党总支书记,马建青一直组织党员开展组织活动:有几位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的入党积极分子,就在这个特殊时期入党;还有一些人在灾区写下入党申请书,马建青将他们的表现报告给原单位,作为后续发展的参考。

因为这次行动,马建青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全国抗震救灾模范”荣誉称号。回顾这段经历,马建青表示:“这个荣誉属于整个团队,我只是作为团长,代表大家领了这个奖。”

有温度的教育开拓者

从教近40年,马建青持续开展教学创新。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面向全国师生免费开放的思政课智能体“浙大·AI思政课一点通”,集成大量思政课专业知识和教学资源。随后,他又带队开发了“浙大·AI心理一点通”,专门服务于心理健康教育,学生可以匿名向它倾诉烦恼,获得初步的疏导和帮助。

2024年4月,马建青主编的全国第一本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数字教材正式出版。这本教材集成了多种互动元素:有将知识点融入游戏的“消消乐”,学生必须正确配对知识点才能通关;有在线心理测验,做完即出结果;有嵌入式AI助教,随时帮助学生答疑解惑;有大量拓展性的“小气泡”,点击人名即可弹出详细介绍和图片……整本教材形式多样,极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程度。

在思政课实践教学方面,马建青和同事探索了覆盖全体学生的教学模式。他们组织学生走进学校各个角落:跟着水电中心师傅巡查线路,了解校园节能问题;跟着食堂工作人员分餐、打包,体验完整的劳动过程;跟着后勤员工打扫卫生,感受工作的辛苦。“学生反馈说,以前觉得打扫卫生很简单,自己跟着做一遍才知道有多累,以后再也不会乱丢垃圾了。”马建青笑着说。

马建青还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研究大学生恋爱、网络暴力、青少年犯罪等社会热点问题。学生通过问卷调查、走访专家、查阅资料等步骤形成研究报告,马建青还会带队组织学

小学教师人工智能教学应用困境与能力提升策略

□ 秦亚东 魏丽娜 刘园园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正逐步从教育辅助工具转变为重塑课堂教学形态、优化育人方式的核心驱动力。小学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根基,是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落地的关键场域,其教学应用成效直接关系到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质量与未来人才培养的方向。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前提是教师具备相应的应用能力,但从当前实践来看,小学教师在人工智能教学应用中面临多重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是认知层面的偏差和困惑。一些教师对人工智能的认知还停留在“技术工具”的水平上,对人工智能教育价值缺乏系统的认知;有些教师觉得人工智能神秘莫测,与日常教学没有太多联系;有些教师把它与传统信息化设备如智能白板和在线题库简单等同起来,没有充分认识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评测、个性化推荐等新兴技术可能给教学方式变革带来的冲击。这些认知偏差造成教师对技术的选择与运用方向感不强,很难真正把人工智能纳入教学设计之中。

二是操作层面技能储备不足。人工智能教学应用需要教师有一定技术操作能力,主要表现在智能工具运用、平台运行和数据解读等方面。然而,目前小学教师队伍特别是中老年教师普遍数字素养不均衡,许多教师面对不断涌现的智能化教学工具不知所措。因此,尽管一些教师存在应用人

工智能技术的意向,但由于技术门槛过高,许多人仍然对其持保留态度,最终使得人工智能的应用仅停留在初级的探索阶段。

三是资源与环境支持相对薄弱。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要想有效发展,必须依靠学校层面的资源保障和环境支撑。然而就实际情况而言,一些学校存在智能硬件设施配置不完善、网络环境不够稳定、对高质量人工智能教育资源平台的访问受到限制等问题。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学校层面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没有明确的规划和运用激励机制,对教师运用人工智能的制度保障和专业支持不足,难以产生持续运用人工智能的内生动力。

四是伦理与安全风险意识需要加强。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领域,涉及学生数据隐私、算法偏见、人机关系界限等多方面伦理问题。小学教师在使用过程中常常不了解这些风险,缺乏必要的数据安全意识与伦理判断能力。比如,在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辅助教学的过程中,如何判断信息是否准确,如何对学生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如何避免对技术过分依赖……这些都要求教师有相应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

基于以上问题,小学教师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提升策略有哪些呢?

深化理念认知,增强应用自觉。学校要把人工智能教育理念融入教师专业发展,通过专题讲座、案例分享、学术沙龙等方式帮助教师精准认识人

工智能教育的价值和场景,着重引导教师意识到人工智能并非取代教师,而是为教学创新赋能,帮助教师摆脱重复性和事务性劳动,从而将更多精力放在育人指导和创造性的教学活动中。此外,还要重视典型示范,发现并推广一线教师在人工智能教学应用中的优秀事例,唤起教师积极探索的内驱力。

构建分层培训体系,提升实操能力。学校应根据教师的不同年龄结构、学科背景、信息技术基础等因素设计分层分类培训内容;对新手教师注重基础技能培训,让他们掌握常见人工智能教学工具的基本使用方法;对骨干教师重点开展深度应用培训,引导他们在人工智能与学科教学融合创新方面进行探索;对教研组长、学校管理者注重规划引领培训,提高他们的顶层设计和组织实施能力。培训方式方面可以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加强体验式和项目式学习,使教师真正获得“做中学”的应用技能。

搭建协同发展平台,强化资源支持。学校要积极为教师人工智能的教学应用创造条件并提供软硬件保障:一方面要加大人工智能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确保网络通畅、设备完善、平台访问方便;另一方面要建立校际协作机制,形成区域人工智能教育共同体,以集体备课、同课异构、专题研讨等方式推动教师经验分享和协同创新。此外,还可以引进高校、教研机构和企业等外在专业力量组建专家指

导团队,对教师进行常态化专业支持和咨询服务。

完善评价激励机制,保障持续发展。学校要把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列入教师专业发展评价体系并建立专项激励措施,对于人工智能教学应用能力突出的教师予以表彰奖励。同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教师敢试敢干,对于出现的问题要及时给予引导和帮助,形成支持创新、宽容试错的良好局面。此外,还需要加强伦理规范建设,增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意识,保障技术应用沿着育人轨道良性运转。

提高小学教师运用人工智能进行教学的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反思、优化:一是坚持育人为本,始终明确技术应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切忌走入一切以技术为先的歧途;二是尊重教师的主体地位,应该激发教师内在动力,培养和扶持政策紧贴教师的现实需要;三是注重差异化推进,不同学校、不同教师的发展基础不同,应该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四是加强连续跟踪和评价,掌握教师的实际情况和困难,进而对支持策略进行动态调整。

人工智能给小学教育提供了广阔空间,提高教师能力则是技术赋能的关键。今后,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迭代与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应进一步构建系统化与常态化教师能力培养机制,促进人工智能与小学教育深度融合,为教育高质量发展带来新动力。

“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作为《黄帝内经》临床核心理念,高度契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全民健康战略导向,深刻彰显中医“疗、养、防”的核心内涵。江西中医药大学自觉肩负服务社会民生、培育时代新人的重大使命,积极探索中医专业类别研究生(简称“中医专硕”)培养模式,走出一条守正创新、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精准破局,重构顶层设计。直面传统中医专硕培养体系中“重已病临床治疗技术训练”“中医预防技术教学碎片化”“学生‘防’‘治’能力割裂”三大现实难点,学校锚定“慈渊仁枢,防术同频”育人目标,着力推进医德与技术一体化发展,创新构建“疗、养、防、术”教育范式,推动教学内容与方法革新,同步传授“防一治”技术,培养学生对中医“疗、养”知识的感知力、掌控力和综合应用能力。

多元赋能,筑牢发展基石。学校精心构建以整体观思维为基础的“双核驱动、六维协同、沉浸赋能”培养模式,创新打造“理念价值重塑+考核激励革新”双核动力引擎,通过厚植中医文化、创新多元评价机制,激活人才内生动力。基于“食疗(养)、灸疗(养)、功疗(养)、香疗(养)、水疗(养)、乐疗(养)”等防治技术,重构六维协同教学体系,培育学生高阶能力。此外,打造学生实践“全流程临床轮转+社区服务”载体,推动医疗服务走进百姓日常生活,开展“院内+院外”轮回式实践,实现“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中医价值本源溯源。

硕果盈枝,彰显实践成效。学校构建的中医专硕沉浸式培养模式成效显著:团队教师先后打造出国家级精品类课程21门,出版研究生教材23部,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全国中医药研究生教育研究重点项目等国家级课题12项;学生中涌

慈渊仁枢铸医魂 防术同频育新人

江西中医药大学构建“六疗六养”中医专硕特色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刘志勇 邱锦申 袁富强

现出全国高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防疫先进个人”等一批优秀典型,多名学生利用学习成果急救救人获广泛报道;参加全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竞赛斩获奖项200余项,发表高质量论文235篇。江西中医药大学将持续深耕中医药人才培养沃土,着力培养兼具大医精诚素养、卓越临床能力和创新思维的拔尖中医药人才,奋力书写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服务社会民生的崭新篇章。